

明清山左作家叢書

李攀龍集

齊魯書社



明清山左作家叢書

〔明〕李攀龍著

李攀龍集

李伯齊 校點

齊魯書社

魯新登字第07號

李攀龍集

〔明〕李攀龍 撰

李伯齊 點校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（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）

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開本 24.5印張 4 插頁 468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000

ISBN 7—5333—0350—4

1·129

定價：22.00元

前言

李攀龍，字于鱗，歷城（今山東濟南市）人。因家近東海，自號滄溟，人稱滄溟先生。生於明正德九年（公元一五一四年），卒於隆慶四年（公元一五七〇年），主盟嘉隆之際的文壇，為「後七子」的領袖人物，詩名高于當代，影響及於清初百有餘年，是有明一代影響較大的詩人之一。

一

李攀龍生當明代中葉，仕於嘉靖、隆慶兩朝。他於嘉靖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五四四年）賜同進士出身，試政吏部文選司，第二年以疾告歸。嘉靖二十六年，授刑部廣東司主事，三年之後陞員外郎，尋遷山西司郎中。嘉靖三十二年（公元一五五三年）外放順德（今河北邢臺）知府，有政績，三年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，不滿一年即借故拂衣東歸，從此隱居故里，十年不起。隆慶改元，起為浙江按察司副使，二年後遷參政，尋遷河南按察使。隆慶四年（公元一五七〇年）母喪毀頓，暴疾而卒，終年五十七歲。

李攀龍從政期間，正是權奸嚴嵩父子竊弄威柄之時，朝政日非，吏治黑暗。在其入仕前一年，即嘉靖二十二年（公元一五四三年），嚴嵩入內閣，從此專擅朝政達二十餘年。「嵩既入內閣，竊弄威柄，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，俱先白嵩許諾，然後上聞。」（一）朝廷內外官員的黜陟進退，亦一決於嵩。嵩「子為侍郎，孫為錦衣中書，賓客滿朝班，親姻盡朱紫。」（二）又「募朝士為乾兒義子，至三十餘輩。」（三）以至不黨附嚴氏，即難立足朝廷。因此，一般士大夫皆「輻輳附嵩」（四），「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遺動以千計」（五），而正直骨鯁之臣，因彈劾嚴嵩，或遭貶外放，或慘遭殺害，以至朝內人人自危。自嘉靖二十四年至李攀龍於嘉靖三十二年離京外任八年之間，大學士夏言、大將曾銑、兵部尚書丁汝夔、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先後被殺，斥逐外放、削籍歸里者，更是難以勝計。即如「七子」中的王世貞、吳國倫、宗臣，或因同情楊繼盛，或因事相忤，亦遭貶外放。李攀龍自稱「傲吏」，「落拓杜門」，「稍類強直」（六），不結交權貴，不黨附嚴氏，因名聲「籍籍公卿間」，雖未遭害，亦淹滯郎署，不得升遷，最終還是外放，且從此未得返京任職。後在其升遷之際拂衣歸里，直至嚴氏父子得到懲治後方始重新入仕，明確表示他不阿附嚴氏的政治態度。在隱居期間，亦不阿附權貴，「繡衣直指，郡國二千石，干旄屏息巷左，納履錯于戶」（七），一概謝絕。相反，他對遭受貶謫、正直不阿的官吏都贈詩贈文，深表同情，並且與當時抗倭御邊的著名愛國將領，如戚繼光、俞大猷、王忬等都過從密切。當薊遼總督王忬遭嚴嵩誣陷論斬之後，他曾寫了《挽王中丞》八首悼詩，表達其崇敬之情，王忬

之子王世貞扶柩南下路經濟寧時，他又不避嫌疑，單騎赴弔，表現出凜然正氣。總之，李攀龍的所謂「狂」、「傲」、「強直」，不只表現出他志操耿介的個人品格，而且也表明他不黨附嚴氏的嚴正態度，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。他關心國事，關心朝內反對嚴氏集團的鬭爭，關心防胡抗倭的戰爭，憂時慮變，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他繼「前七子」之後發動文學復古運動的原因。

二

李攀龍一生的文學活動，大體與其仕宦生涯相始終。在他入仕的第二年，即嘉靖二十四年（公元一五四五年），「以疾告歸」，「歸則益發憤勵志，陳百家言，附而讀之，務鉤其微，挾其精，取恒人所置不解者，拾之以績學。蓋文自西漢以下，詩自天寶以下，若為其毫素污者，輒不忍為也。」〔八〕在此期間，文學復古思想逐漸形成。第二年返京，此後王世貞、宗臣、吳國倫、梁有譽、徐中行等亦先後進士及第，並任職郎署，而謝榛亦以布衣在京師盤桓。「既曹務閒寂，遂大肆力於文詞」〔九〕，「以為記述之文，厄於東京，班氏姑其狡狴者耳。」〔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歷，代有降而體不沿，格有變而才各至，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，而能縱其夙授，神解於法之表。句得而為篇，篇得而為句，即所稱古作者，其已至之語，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，未發之語，為天地所祕者，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。亡論建安而後諸公，有不遍之調，于鱗全收之，即其偏至而相角者，不啻敵也。〕〔一〇〕由此李攀龍樹起了文學復古的旗幟，明確提出自己的文學主

張，並大力進行詩歌創作。由於詩才超軼，受到王世貞等人的標榜、稱引，聲譽漸高，遂居「七子」之首，成為文壇泰斗。此時「七子」濟濟京師，賦詩論文，志投意合，遂形成一個新的文學集團。他們與「前七子」遙相呼應，前激後揚，繼續把文學復古運動推向高潮，當時「天下推李（夢陽）、何（景明）、王（世貞）、李（攀龍）為四大家，無不爭效其體。」（二）李攀龍更被推尊為「文苑之南面王」（三）。

李攀龍詩文創作，可以家居為界，分為三個時期。即居京、知順德、提學陝西為前期，家居十年為中期，起復浙江和按察河南為後期。前期「七子」聚會京師，為文學復古運動的發軔期。「及其自秦中掛冠，搆白雪樓于鮑山，華不注之間，杜門高枕，聞望茂著，自時厥後，操海內文章之柄垂二十年。」（四）中期是其創作的高峯期，亦是確立其文壇領袖地位的重要時期。這期間所寫詩文，殆居《滄溟集》之太半。他自休居之後，一方面大力撰寫擬古詩，張揚文學復古，「差次《古樂府》擬之，又為《錄別》諸篇及它文益工，不脛而走四裔」（五）；一方面，他又流連於家鄉秀美的湖光山色之間，或抒情言志，或紀游寫景，多有近體精拔之作，使其詩歌藝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。至於後期，起復之初，興會淋漓，尚有數篇佳作，而後則因其名聲日隆，請為序其詩文集者或請為先人寫墓誌、傳記者漸多。如今集中的序文、墓誌、祭文、傳記、書信，多為此一時期所寫，但却少有扛鼎之作。

李攀龍雖主盟文壇却無文學理論著作，他有關文學的言論，僅散見於一些序文，如《選唐詩

序》、《比玉集序》、《蒲圻黃生詩集序》、《送王元美序》等，以及與王世貞、宗臣、徐中行等的書信之中，不集中，不系統。「七子」中之謝榛、王世貞有專門著述，而文學觀點又與李攀龍有所不同。因此，我們祇能通過詩文創作來瞭解李氏的文學主張及其觀點。

三

李攀龍詩文，在其死後的第三年，即隆慶六年（公元一五七二年），由其好友王世貞整理刊印，共三十卷，名《滄溟集》。集中收各體詩歌一三八〇餘首，各類文章二四〇餘篇。是否尚有散佚作品，已不得而知。

李攀龍以詩名世，其文古奧艱澀，佶屈聱牙，向稱難讀。即在當世，已為人所詬病。今集中所錄諸文，除少數篇章，如部分遊記、傳記和與友人的部分書信，尚屬可讀之外，藝術方面多無可取。而對其詩歌，則應取分析的態度，分別加以討論。在現存詩歌中，擬古詩二一〇餘首，模擬痕迹較重的古體詩一九〇餘首，兩者相加，約佔《滄溟集》中詩歌的三分之一。擬古詩如《古樂府》、《錄別》、《古詩後十九首》等，幾乎是句句模擬，篇篇模擬，「句摭字摭，行數墨尋，興會索然，神明不屬」（「一五」），毫無藝術性可言。《古樂府》詩有序，說明他所主張的模擬，有如漢代胡寬之在長安營建新豐，雞犬皆識其家。即不求神似，而追求形似，以「所稱之古作者其已至之語，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」（「一六」）為進入妙境。因此，有些摭摭漢魏樂府或古詩字

句湊泊成篇，如《陌上桑》一詩，即將漢樂府《陌上桑》和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》兩詩經篡改，拼湊而成，與原詩思想內容亦相徑庭，非驢非馬，不知云何。在今天看來，這類作品中，只有少數篇章，如《古樂府》中的《東光》、《紫驪馬歌》、《懊儂歌》、《枯魚過河泣》等，因增進現實內容，尚屬可讀。至于古體詩，似不應完全與擬古詩相提並論，一概加以否定。

在李攀龍的古體詩中，七言古較多，寫得也較好。其中雖不免時有模擬古文辭之弊，但不少篇章感情真摯、氣勢奔放，在藝術上有可取之處。如《拂衣行答元美》向好友王元美說明致仕歸休之由，《答許右史二首》之一則表示了對追逐名利的世俗之徒的蔑棄，都寫得意氣激揚，感情奔放。在其由陝西任所辭歸之年的歲末所寫的《歲杪放歌》一詩寫其初歸時的心情頗為真實：

終年著書無一字，中歲學道仍狂夫。

勸君高枕且自愛，勸君濁醪且自沽。

何人不說宜游樂，如君棄官復不惡。

何處不說有炎涼，如君杜門復不妨。

縱然疏拙非時調，便是悠悠亦所長！

自怨自艾，自慰自嘆，曠達之中隱含着酸苦，強言歡樂之中流露出鬱憤不平，痛快淋漓而又意蘊深厚，是這類詩的共同特點。而《贈殿卿》一詩則云：「身經畏途色不動，心知世事口不論。自顧平生為人淺，羨君逃名我不免。自憐垂老尚憑陵，羨君混世我不能。有酒便呼桃葉妓，得錢即

飯蓮花僧。」表明自己初歸時不與世事、堅不苟合，逃名世外、縱酒任放的生活態度，憤激之情溢於言表。在《逼除過右史水村江山人同賦》一詩中，因為有「意氣還須我輩看，功名但任兒曹立」之句，而為「兩臺監司」諸公所疾恨，幾乎招惹一場麻煩（一七）。可見李氏這類詩中，尚有貼近現實的內容。至如此類詩中即景寫情、應答贈友之作，雖時有擬古之弊，但多自然真切，「元美所標榜，頗失之太過」（一八），而有的論者一概否定，似亦失之偏頗。對於這類詩，我們既應把它放在文學發展過程中加以考察，指出其襲古、擬古的流弊，也應聯系當時的歷史狀況和文學形勢，認識其所具有的文體改革的積極意義。明代許學夷評論較為公允：「李于鱗（名攀龍）樂府五言及五言古多出漢魏，世或厭其摹仿。然漢魏樂府五言及五言古，自六朝、唐、宋以來，體制音調後世邈不可得，而惟于鱗得其神髓，自非專詣者不能。至於摹仿鉅釘或不能無，而變化自得者亦頗有之。若其語不盡變，則自不容變耳，語變，則非漢魏矣。所可議者，於《古樂府》及《十九首》、蘇李《錄別》以下，篇篇擬之，殆無遺什，觀者不能不厭耳。」（一九）

四

李攀龍詩歌中，藝術性較高、向為人所稱譽的，是近體詩。而這類詩歌，又約佔李氏全部詩歌的三分之二，評價作為詩人的李攀龍，理應以這部份詩歌為主。

在李氏近體詩中，五言律數量較少，而且在藝術上「體雖宏大，而警絕者少」（二〇）。然也

不乏自然流暢之作。如自陝歸休之初寫的《春日閑居十首》之十：

五柳暗湖濱，先生隱是真。

文章堪側目，潦倒竟全身。

何必論交地，長須縱酒人。

即令蹈東海，斷不混風塵！

自言為全身避害而隱居湖濱，寧逃隱海上也決不苟合取容、混跡官場。骨氣錚錚，確有陶淵明氣概，而意象淺露，却無陶詩的神韻。「古寺馬蹄前，荒山斷復連。階危孤石倒，崖響亂泉懸。喬木堪知午，回峰半隱天。」（《同許右史游南山宿天井寺》）寫荒山古寺的景象，「五十江湖客，風塵一事違。漁樵供藥餌，雨雪偃荆扉。白髮詩篇苦，清齋病色微。平生拚縱酒，今日不知非。」（《《元日》》）寫其病苦無聊而又負氣自傲的心境，都十分生動真切。

李氏七言律，一向評價較高。這類詩歌雖極意規步唐人，而氣骨風神自具，自是一代大家手筆。如果說這部份詩歌，對明代萎靡的詩壇「有起衰之功」（二），似不為溢美。茲舉幾例以說明之。如《於郡城樓送明卿之江西》：

青楓颯颯雨淒淒，秋色遙看入楚迷。

誰向孤舟憐逐客，白雲相送大江西。

這是一首贈別詩。明卿即「七子」之一的吳國倫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因彈劾奸相嚴嵩而論死，國

倫激於義憤，在楊被處死後倡議賻送，而觸怒嚴嵩，旋由兵科給事中謫貶江西按察司知事，南行赴官，經李攀龍居官的順德，李在府城為其送行。自李攀龍外放順德之後，「七子」亦先後遭貶外放，星散各地。當年聚首京華，抱著改革時政和革新文風的雄心壯志，志意昂揚，是何等豪壯，而如今衆友離散，又是何等的冷落！面對摯友，無力救助，且無以相慰，心境之蒼涼，離緒之紛繁，何以名之？「青楓颯颯雨淒淒，秋色遙看入楚迷。」淒風苦雨，肅殺蒼茫的秋色，便將此時心境婉婉道出，纏綿低回，深沉而含蓄。「誰向」二句振起，道出對詩友高尚品格的理解、同情，並以「白雲」一語雙關，既表示寄心白雲與之相伴，患難與共，又喻指像白雲終將出現於澄空碧霄一樣，前程充滿希望。詩借景寫情，纏綿之中充溢着豪氣，風神高邁而情致婉轉，樸實無華而又意蘊深厚，確乎為同類作品中的上乘佳作。他如《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》、《塞上曲送元美》、《送子相歸廣陵》等，在藝術上也各有千秋。

李氏紀游寫景亦不乏佳作。李攀龍知順德，曾登太行山脉的黃榆、馬陵，視學陝西，曾登臨華山峰頂，游歷平涼、崆峒，賦閑家居，更是徜徉於故鄉湖光山色之中。在其筆下，祖國的高山大川，或雄峭俊偉，或精麗高華，讀之或如觀飛瀑奔瀉，或如臨潺湲溪流，景物不同，感受各異，都能給人以美的享受。如被人譽為「千古絕唱」的《杪秋登太華山絕頂四首》（二二）。嘉靖三十五年（公元一五五六年）秋末，詩人登臨華山峰巔，「俯三峰，望中原，見黃河從塞外來，下窺大壑，精氣之所出入，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」。（二三）華山的險峻、峭拔，絕頂景象的宏闊、奇

異，使詩人激動不已。在華山峰頂縱目望去，黃河在山下奔流遠去，中原風光隨漫漫秋色入目而來，高峻的仙人掌峰與蓮花（即芙蓉）峰相連，峭壁千仞的蒼龍嶺茫茫一徑與亭亭而立的玉女峯相通，蓮峰高聳雲外，與長天翠碧一色，玉女峯常年披雪，如同含愁俏立的妙齡女郎。在詩人筆下，華山的高峻壯闊的氣勢，表裏山河的雄偉景象，都栩栩再現出來，確為詠寫華山的「古今絕唱」。如其中的第二首寫得較好：

縹緲真探白帝宮，三峰此日為誰雄？

蒼龍半掛秦川雨，石馬長嘶漢苑風。

地敞中原秋色盡，天開萬里夕陽空。

平生突兀看人意，容爾深知造化功。

至於家居期間，對濟南大明湖、千佛山、華不注、龍洞等景勝的生動描繪，無處不洋溢著詩人對家鄉山山水水的熱愛之情，且在藝術上也更臻圓熟。如《神通寺》：

相傳精舍朗公開，千載金牛去不回。

初地花間藏洞壑，諸天樹杪出樓臺。

月高清梵西峯落，霜清疏鐘下界來。

豈謂投簪能避俗，將因卧病白云隈。

神通寺在今濟南市南郊，泰山北麓，玉符河（即錦陽川）畔，即山建寺，建築雄偉，風景秀麗，

為北朝以來佛教名剎。詩融進關於琨瑤山和神通寺的美麗傳說，寫神通寺的神奇、雄麗、清幽和靜寂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遠離塵囂、出世脫俗生活的企慕，都真切而生動，表現出此類詩雄俊超逸、氣勢奔放和意境開闊的特點。

明代中期內憂外患，危機深重。李氏寫有不少關心時政、憂慮國家命運前途的詩歌。也有一些詩斥奸勵忠，在朝廷內部尖銳鬭爭中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傾向。其中尤以關心邊事、頌揚抗敵御邊的愛國將領之詩，寫得最為動人。嘉靖二十九年（公元一五五〇年）夏，俺答寇大同，入薊州塞，迫近古北口；第二年，東南沿海倭寇猖獗，騷擾閩浙一帶。而至嘉靖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五五四年）初，倭寇由蘇南寇掠長江以北，更有騷擾青徐一帶者，山東為之震動。這時期李攀龍寫有《送張肖甫出計閩廣》、《春興》等詩，對沿海抗倭寄予極大關注。如《春興》：

東南殺氣日相纏，重憶先朝海晏年。

使者自歸沉璧馬，將軍誰起護樓船！

旌旗愁動昆明色，大鉞高懸薊北天。

坐使越裳來白雉，更追驕虜過燕然。

此詩寫於嘉靖三十四年（公元一五五五年）。嚴嵩親黨趙文華徵用直隸軍兵派赴平倭前綫，因其貪冒無能，慘遭失敗，致使倭患更加嚴重。詩人撫今追昔，期望有如漢樓船將軍者負起抗倭御邊的重任，以消弭外患。然而，朝廷腐敗，所用非人，更使詩人憂憤無端：「郎署即今多顧問，誰

憐魏尚有邊才！」〔二四〕他既為自己「報國片心還獨在」〔二五〕而自慰，亦為報國無力而悵惘。「欲投萬里封侯筆，愧我讀經鬢有華！」〔二六〕此類心情，在其送友人赴邊的詩篇中屢屢道及。因此，當隆慶改元（公元一五六七年），起復為浙江按察副使兼攝海篆之時，在浙江見到同戚繼光合力抗倭的名將劉顯，傾蓋相交，視同知己。二人同至海上「登場大閱」，見以「戚家軍」為主體的抗倭軍將「紀律森嚴，士氣踴躍，技藝精湛，可蹈水火」〔二七〕，便抑制不住激動的情懷，寫下了《大閱兵海上》四首加以頌揚，表現出詩人熾烈的愛國熱情。如其中第一、第二首云：

使者乘輅大閱兵，千艘並集甬句城。

騰裝殺氣三江合，吹角長風萬里生。

帳擁樓臺天上坐，陣回魚鳥鏡中行。

不知誰校昆池戰，橫海空傳漢將名。

戈船諸校錦征袍，水戰當場命客豪。

萬櫓軍聲開島嶼，千檣陣影壓波濤。

赤城深泛旌旗動，射的遙衝竹箭高。

東海便應銅柱起，何妨馬援是吾曹！

詩寫抗倭軍將士氣高漲、陣容威嚴、技藝精熟，熱烈贊頌其矢志報國的昂揚關志。熱情奔放，大

氣磅礴，造語精拔而意境開闊，顯露出詩人超軼的藝術才華。

嘉靖三十九年（公元一五六〇年），王世貞之父王忬為嚴嵩構陷致死。王忬自嘉靖二十九年（公元一五五〇年）凡三遷邊職，破敵御邊屢建功勳，是一位鐵骨錚錚、軍功卓著的邊帥。只因不黨附嚴嵩，而終遭殺害。李攀龍敬慕其為人，生前曾寫詩贊頌其邊功，死後又寫了《挽王中丞》八首進行悼念。如其中第一、第二首云：

司馬臺前列柏高，風雲猶自夾旌旄。

屬鑣不是君王意，莫作胥山萬里濤。

幕府高臨碣石開，蘇門丹旆重徘徊。

沙場入夜多風雨，人見親提鐵騎來！

詩高度贊揚王忬守邊功績和愛國精神，對其慘遭殺害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同情，雖對昏庸的嘉靖皇帝有所回護，而其鋒芒却直接指向權奸嚴嵩，這在當時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啊！

李攀龍的七言律詩，一向為人所推重。屬於「後七子」詩派中「末五子」之胡應麟，較為注重詩歌的藝術性，因對詩風轉變後的王世貞備加推崇，而對李攀龍却不無瑕疵。他從同時代相比較的角度，認為李氏「七言律絕，高華傑起，一代宗風」，病在「屬對偏枯，屬詞多重復」。「二八」即便對李攀龍極力貶抑、不無偏見的錢謙益，在轉錄別人評論時，也不得不說「絕句向入妙境」，「七言律最稱，高華傑起。拔其選，即數篇可當千古」，而其弊病在於「格調詞意，不

勝重復」〔二九〕。這類評價，大體是公允的。許學夷從詩體發展的角度，評論亦較中肯：「于鱗七言律，冠冕雄壯，誠足凌跨百代，然不能不起後進之疑者，以其不能盡變也。唐人五七言律，李杜勿論，即王孟諸子，莫不因題制體，遇境生情。于鱗先意定格，一以冠冕雄壯為主，故不惟調多一律，而句意亦每每相同，元美謂「守其俊語，不輕變化」是也。」〔三〇〕

五

關於明代「前後七子」的文學復古運動，自明代以來即毀譽不一，衆說紛紜。毀者攻訐其擬古剽竊，全盤否定，譽者則鼓吹其起衰救弊，功德蓋世；其中或執其一端，不及其餘，或拘於門戶，故甚其辭，都有偏頗之處。近之論者，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，結合明正德、弘治和嘉靖、隆慶之世的歷史狀況，評其功過，辨其得失，在主要方面，看法漸趨一致。

明代中葉的文學復古運動，前後持續半個多世紀，而影響百有餘年。就整體而言，這次文學復古運動，與哲學領域王陽明心學運動相呼應，力圖冲破程朱理學的桎梏，改變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文學「臺閣體」的統治地位，以挽救正宗文學（詩文）的危機；如從具體情況考察，看一看李攀龍等所處的時代及其政治態度，「後七子」之所以能形成一個文學集團，似乎不僅僅是文學情趣的契合，而是有着明顯的政治因素。因此，我們在其「以起衰救弊為己任」〔三一〕的文學復古旗幟下，不應忽略李攀龍等發動這場文學運動的深層意蘊；他們所起之「衰」和所救之